

文化景址(七)

兴隆山固伦公主陵

在通榆县兴隆山镇,有一处距今200多年的清廷公主固伦纯禧的陵墓。

清朝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对蒙古族的统治,采取“满蒙联姻”的政治策略,将许多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圣祖康熙的异母弟恭亲王常宁的大女儿、19岁的固伦纯禧公主嫁给了开国功臣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九世扎萨克班第王孙。

公主陵园长94米,宽40米,内有坐北朝南的享殿(地上庙宇)5间,东西两厢配殿各3间。墓室在享殿地面下部,分左右两室,左室为陪葬侍女,右室乃公主陵寝。木棺内尸骨头北脚南,仰身直卧。头戴赤金凤冠,横枕黄金元宝,身着丝织单夹衣裙多层数件,虽已腐烂成片,仍清晰可见暗花衬地和龙纹图案。

这个妖孽。后来,百姓为了感谢二郎神,便在此处修建了一座庙宇,取名“二郎庙”。而庙旁那片湖,据传为二郎神因口渴难耐而用其三尖两刃刀掘出的神泉,自然称作“二郎湖”了。

陵园内外一株株古老繁茂的蒙古黄榆如撑起遮阳的绿伞,一道道隆起的沙岗似挡风的围屏,默默地守护着公主的亡灵。

二郎庙

二郎庙坐落在通榆县城西郊3000米处,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修建。庙内塑有3.3米高的汉白玉二郎神像,银盔素甲的二郎神凝眉立目,威猛的哮天犬警视四周。庙内香烟缭绕,参拜者络绎不绝。在二郎庙附近,有一片古老的水域,名曰“二郎湖”。

传说这里曾有一条蛇精,经常出来害人,人们却拿它毫无办法。终有一天,天上的二郎神得知此事,为了结束人间悲剧,用神法降伏了



二郎庙



固伦公主陵

走近古文字(中)——音的定准

穿越到唐朝,谁去最合适?

熊建

音素,只要认识26个字母就可以拼读。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它本身不表示音素。所以,识字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人打小就必须闯过的一个重要关口。

汉代以前,人们给汉字注音采取譬况描述的方法,即描述发音时有关发音器官的动作及发音部位的状态,比如“急气”“缓气”“急舌”“缓口”。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比方为

音”就是这意思。由于当时对人体发音器官的解剖分析还很不精细准确,对发音方法的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所以这种譬况描述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后来的人看了这种注音,往往不得要领,很难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念出来。

后人就发展了,推出了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或者近音字来注音。古书里凡是说

“读若”“读为”“某音某”的,就是这个方法。比如“饰读若式”“傅音附”。此法弊端显而易见,一来不是每个字都有同音字,二来有的同音字比要注音的那个字更加生僻难念。

所以,人们又发明出来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来拼读一个字,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合起来读。比如“东,德红切”,用“德”字的声母合上“红”字的韵母一起拼,就能拼读出“东”这个音。

自从有了反切法,全部汉字的注音就成为了可能,各种韵书才得以出现,中国的音韵学才能一代比一代缜密地发展下来。而其他省份的人,不会粤语,若要穿越到唐朝,不也得靠反切法才能与唐朝人交流?所以,反切法才真可称得上是穿越必备宝典。

古书今读

我看我说

司马迁与「水利」词源

张奎平

中国的治水活动源远流长,治水活动常常以“水利”之名概括。“水利”一词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

公元前132年,自战国时代即屡屡为患的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方)决堤。23年后,汉武帝亲临决口现场,指挥将军以下文武官员负责工程材料进行封堵,其中就有时任郎中一职的司马迁。这一特殊经历,直接促使他在《史记》中开辟《河渠书》一章,梳理自大禹到汉武帝时代,中华先民防治水患、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壮阔历史,并使用了“水利”一词。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许多行业与学科名称,译词或借鉴自外来词汇。即便其词源来自古代汉语,古今含义大多已迥然不同,如经济、物理等。然而,“水利”一词,则与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的意义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是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治水活动,包括瓠子堵口、长安至潼关一线的运河工程、沟通汉水与渭水流域的山地运河建设构想、今山西南部与关中平原东部等处的灌溉渠道建设等。司马迁以较详细的笔墨介绍了决策背景与建成后的实际效益:“自是(瓠子堵口成功)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司马迁时代“用事者”所争言的“水利”,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以黄河干流沿岸为代表的洪水治理、以运河修建为主的河道整治以及以渠系建设为核心的灌溉事业。时至今日,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依然是现代水利事业的主要内容。

早在司马迁之前,关于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活动的文字记录,已见于各类文献中。防洪方面,春秋末期成书的《左传》记载,齐国在抵御晋国进攻时曾“壅防门而守之”,学者认为这里的“防”就是济水南岸的防洪堤坝。河(航)道治理方面,被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在《禹贡》一篇里记载了大禹疏浚开凿各地河道的情形。灌溉方面,《诗经·小雅》中的《白华》有“漉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一句,这里很可能是人工渠道的意思。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现中不断揭示的中国早期治水成就的遗址、遗迹相互印证。在司马迁笔下,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并由此赋予“水利”一词以明确的内涵,故现代中国水利行业长期把《史记·河渠书》作为“水利”一词的来源。

在司马迁之后,“水利”一词的使用情况有所变化,在很多时候特指灌溉。如唐代杜佑编集的《通典》中,于《食货典》下设有《水利田》一门,专门介绍历代渠道与灌区建设。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曾专门颁布“农田水利法”,此处“水利”亦特指灌溉。事实上,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往往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司马迁对此有清晰认识,故将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这与现代水利行业的有关认识极为相近。今日广义的水利事业与水利学科,更增加流域管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景观营造等内容,各分支内容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可见,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写作时已经既注意到治水事业内涵的丰富性,更注意到其内在的统一性。

汉武帝时代的防洪、河道治理与灌溉工程,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自然也变得巨大。司马迁意识到,水利事业可以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收益,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水的“利”,既是指水作为资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动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利”。

今天,中国水利事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中国治水历史符合逻辑的延续与发展。重温司马迁“水利”一词蕴含的深刻内涵,是有意义的。

第三章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五、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

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主张,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展开谈判,并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

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国际国情的科学分

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政治上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要点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

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17)